

## 雪蘭莪最後的甲必丹葉觀盛：馬來半島的舊英殖民政治制度的餘暉(1890-1902)

莊仁傑\*

本文意欲探討馬來半島的英國殖民地在新舊政治制度交替之時，舊政治制度在結束前的最後一刻，如何繼續發揮並維持影響力，以及如何被其他領袖挑戰。具體而言，即：當代表英殖民新政治制度的華民護衛司及其管理的華民護衛司署出現，舊政治制度的代表——甲必丹如何在種種限制下——例如英殖民政府開始透過華民護衛司署管理華人事務，以及會黨暴力被禁止——繼續執行其政治任務與發揮影響力。本文嘗試以雪蘭莪最後一位甲必丹葉觀盛(1890-1902)為個案，透過1890年代在吉隆坡成立的三個華人機構——葉氏宗祠、同善醫院和廣東義山，及其成立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探討在新舊制度交替的當下，新馬華人社會領袖如何維持自己的權勢與地位，並如何領導華人社會。

關鍵詞：甲必丹、葉觀盛、直接統治、間接統治、英國殖民地、華民護衛司、吉隆坡

---

\*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獨立學者。  
通訊信箱：henry72783@hotmail.com

## 一、前言

自十九世紀末開始，東南亞各個殖民地逐漸從間接統治走向直接統治，開始以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統治工具取代東南亞各地原有的政治制度與統治方法。這現象也發生在英國統治下的馬來半島，並可見到英國的統治力量深入滲透到馬來半島各個殖民地的政治系統的各個層面。<sup>1</sup>例如海峽殖民地政府廢除餉碼制度，<sup>2</sup>以及查禁會黨禁止私人暴力；<sup>3</sup>在吉打，英國法逐漸取代傳統法；<sup>4</sup>以及雪蘭莪、霹靂(Perak)、森美蘭(Negeri Sembilan)和彭亨(Pahang)——合組成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這一政治實體，建立一個中央政府以推行中央化政策，並把英國統治力量落實到統治的末梢。<sup>5</sup>

但是，馬來半島上各個英屬殖民地的新政治制度取代舊制度的汰換過程並非馬上完成，新舊制度不但會同時並存；甚至在新制度落實並且舊制度廢除之後，舊制度的習慣與主事者仍然留存於新制度中。新政策與新制度必須在實施一段時間之後才會見效，其中的時間落差被稱為政策時差。<sup>6</sup>由於政策時差，以及民眾必須花些時間適應新制度，再加上英國自殖民開始就面對行

<sup>1</sup> Carl A. Trocki,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ed. Nicholas Tarling, vol. 2, pt. 1, *From c. 1800 to the 1930s*, ed. Nicholas Tarl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90-97.

<sup>2</sup> 餉碼制度即為包稅制(Tax Farm/Revenue farming)，國家透過公開招標，把政府對某樣商品或活動的徵稅權交給得標者，得標者只需支付某個固定金額即可。由於早期的科技限制，以及政府缺乏執行徵稅的制度與人力，因此把相關事務交由民間得標者負責。

<sup>3</sup>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 2015), 152-156;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南洋學會，2015)，頁 47-153。

<sup>4</sup>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153-162.

<sup>5</sup> Anthony Reid,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5), 243.

<sup>6</sup>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3-12; 曹佳，〈從政策公佈到生效：政策實施的時間差分析〉，《公共行政評論》，第 5 期(廣州，2020)，頁 144-159。

政官員不足的問題，<sup>7</sup>導致馬來半島上各個英國殖民地即使進入二十世紀初期，仍未完全由新制度取代。因此，一些舊制度不但與新制度並存，甚至政府給予資源，或舊制度的人事物採取一些方法，讓舊制度在正式結束之前，仍可繼續發揮影響力。

在討論東南亞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的新舊制度轉換過程時，常常以從間接統治到直接統治作為討論的焦點。<sup>8</sup>Benda 指出海峽殖民地屬於直接統治，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則是間接統治。<sup>9</sup>但是，Benda 在分析時是以殖民地為單位，忽略同一殖民政府可能對不同人群有不同的統治方式，也未討論在這轉變時期中的當地政治精英如何面對這些轉變。Trocki 不但強調必須從時空脈絡了解新舊制度轉變的重要性，也指出雖然東南亞的政治制度發展以直接統治為目標，但是新舊制度的轉變並非馬上完成，而是會有新舊制度並行時期，甚至舊有制度的人事物會藉由新制度還魂。<sup>10</sup>Trocki 為間接與直接統治的脈絡與過程做了詳細解釋，但是並未討論新舊制度並行期間，舊制度之下的人事物如何利用舊制度並維持與發揮影響力。吳佩珊討論吉隆坡自 19 世紀下半葉到 20 世紀初之間，英殖民政府開始用法律處理華人社會的事務，代表英殖民政府如何從人治走向法治。<sup>11</sup>但如果法條設置後沒有好好執行，就只是沒有效力的一紙文書。再加上政策從制定到落實之間有時間差(政策時

<sup>7</sup> 殖民政府始終面臨人力短缺問題之苦。在二十世紀初，雪蘭莪華民護衛司署的官員人數只有數十人但卻要面對上萬華人居民；吉打殖民政府在馬來鄉區的行政效能也不高，能夠調動的警力不足，對鄉區的控制有限。見莊仁傑，〈殖民統治方法變動的契機：以 1912 年吉隆坡華人騷亂為核心〉，《新史學》，第 34 卷第 4 期(臺北，2023.12)，頁 163-214；Cheah Boon Kheng, *The Peasant Robbers of Kedah, 1900-1929: Historical and Folk Perceptions*, 2<sup>nd</sup> ed. (Singapore: NUS Press, 2014).

<sup>8</sup>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上半葉，東南亞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經歷現代化的衝擊與變遷。在政治上除了因為科技進步和統治工具的成熟，而從間接過渡到直接統治之外，經濟上也從勞力密集走向資本密集，社會也變得多元並且受到諸多西方思潮如民族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等的影響。參考 Nicholas Tarling,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2, pt. 1.

<sup>9</sup> Harry J. Benda, "Political Elites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7, no. 3 (1965): 233-251.

<sup>10</sup> Trocki,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90-97.

<sup>11</sup> 吳佩珊，〈英殖民政府對吉隆坡華人事務管理——從自治至法治的轉變(1868-1914)〉(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差)，<sup>12</sup>所以立法並不必然導致法治馬上出現。此外，這些法條的設置主要是為了政府比較能夠容易看到人民及統治人民，但是實際上人民並不一定遵守法條，而會按照自己的意願忽視法條，甚至「玩弄」法條來達成自己的目的。<sup>13</sup>莊仁傑透過 1912 年吉隆坡的閩粵衝突為個案，指出從間接統治走向直接統治的過程，但是文章討論的是新制度之下的舊制度遺留與新制度運作的實際情況，並未觸及新舊制度並存時期的情形。<sup>14</sup>因此，新舊制度交替之際，舊制度如何在快結束之前發揮其影響力，具有討論的價值。

過去有許多討論英屬馬來亞的新舊政治制度的研究，其中有不少論及新馬華人社會的甲必丹及華民護衛司(Protector of Chinese)。馬來王國統治者或殖民政府委任族群領袖擔任甲必丹，賦予他管理其所屬族群與裁決族群大小爭議的權力，透過甲必丹進行間接統治。<sup>15</sup>由於政府武力不足，因此 19 世紀的甲必丹在治理華人社會時往往必須借由會黨武力管治華人社會，並且華人領袖也藉此取得財富與地位。<sup>16</sup>雖然顏清滄指出華人會黨領袖和華人領袖／甲必丹通常都是同一人，並且英殖民政府取締華人會黨導致華人領袖／甲必丹與會黨脫鉤，進而加強華人領袖與其他華人社團組織的連結，但是並沒說明甲必丹與華人會黨脫鉤之後，如何與華人社團增強連接。<sup>17</sup>

<sup>12</sup> Douglass C. North,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3-12; 曹佳，〈從政策公佈到生效：政策實施的時間差分析〉，頁 144-159。

<sup>13</sup> 人們如何忽視政府政策與法律的限制，甚至利用政府政策與法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見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sup>14</sup> 莊仁傑，〈殖民統治方法變動的契機：以 1912 年吉隆坡華人騷亂為核心〉，頁 163-214。

<sup>15</sup> 阮湧銜，〈吉打客家籍甲必丹與華人方言群社會的互動——以戴春桃與羅啟立為個案〉(金寶：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莊仁傑，〈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遊神為個案〉，《民俗曲藝》，第 212 期(臺北，2021.06)，頁 2。

<sup>16</sup>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62-74; 楊進發，〈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 3-20；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頁 101-119。

<sup>17</sup> 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101-119。

自 19 世紀末英殖民政府開始取締華人會黨打擊暴力，且設立華民護衛司署(The Chinese Protectorate)作為管理華人的主要機構，甲必丹制度開始沒落。《1889 年社團條例》(The Societies Ordinance 1889)頒布之後，海峽殖民地的會黨暴力開始被限制，華人領袖不能再以暴力管治華人社會。<sup>18</sup>在雪蘭莪，雖然甲必丹權力不斷下滑，但是直到 1899 年《華民政務司法令》(The 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 Enactment)通過，華民護衛司和政務司具有對華人事務的司法審判權和社會影響力，才真的取代華人甲必丹成為統治華人社會的殖民政府官員。<sup>19</sup>

以上研究指出，馬來半島的英殖民地如何從間接統治走向直接統治，並且新舊制度如何交替。雖然舊制度的代表——甲必丹制度——逐漸被新制度——華民護衛司——所取代，也促使華人領袖必須和政府合作並不繼續以來暴力來治理華人社會，但是在新舊制度交替之際，舊制度如何繼續發揮影響力，具有探討的價值。本文嘗試以雪蘭莪最後一位甲必丹葉觀盛(1890-1902)為個案，透過 1890 年代在吉隆坡成立的三個華人機構——葉氏宗祠、同善醫院和廣東義山，及其成立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探討在新舊制度交替時，新馬華人社會領袖如何在禁止暴力以及華民護衛司開始出現的情況下，繼續維持自己的權勢與地位，並如何領導華人社會。也藉此個案指出，英國由於政策時差與各種當地因素(殖民政府官員人員不足，以及當地人民對新制度的調適等)，舊制度的遺存如何在這新舊制度交替、舊制度即將走向歷史的最後時刻，如何持續地發揮影響力。

本文以葉觀盛及其治理下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為個案，但是有關吉隆坡華人社會在 1890 年代的發展的研究不多。《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以戰前吉隆坡為主，其中部分內容涉及當時吉隆坡的華人社會，可是對於當時作為吉隆坡社會主體的華人社會的變化則沒著墨太多。<sup>20</sup>黃文斌雖然討論吉隆坡華人定居社會的出現，以及客家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並無深入分析權力

<sup>18</sup>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頁 135-153。

<sup>19</sup> Chin Yoon F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of Selangor 1896-1906," *Malaysia in History* 15, no. 1 (1972): 30-42.

<sup>20</sup> J. 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Kuala Lumpur: MBRAS, 2000).

如何從惠州人轉移到廣肇人。<sup>21</sup>雖然張曉威從方言群切入，討論吉隆坡的幫群政治，但沒深入談論吉隆坡最後一任甲必丹葉觀盛在權力從惠州人轉移至廣肇人時，如何透過各種機構整合並穩定兩方人馬。<sup>22</sup>根據以上研究，可知當時葉觀盛不但必須採取非暴力的方法治理華人社會，也必須面臨吉隆坡華人社會內部對他的權力與地位的挑戰。因此，葉觀盛在各種難題之下，如何鞏固與維持自己的權力，以及治理吉隆坡華人社會，對本文問題是一個很好的個案。

由於史料不多，本文所採用的史料除了一些官方檔案之外，也大量使用各個會館與宗祠等機構所出版的會刊、資料集與族譜等文獻。例如《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sup>23</sup>、《雪隆惠州會館館史》<sup>24</sup>、《吉隆坡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sup>25</sup>、《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sup>26</sup>與《葉姓族譜》<sup>27</sup>等等。

## 二、1890 年代的吉隆坡：甲必丹葉觀盛與英國殖民政府面對的局面與問題

本節除了敘述雪蘭莪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的轉變，也將講述 1885 年葉亞來過世之後，華人社會的領導權力由惠州人轉移到廣肇人的過程，以及雪蘭莪英殖民政府的現代化過程與難題，為文章隨後的內容做鋪陳。

<sup>21</sup> 黃文斌，〈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1859-1920)〉，《亞洲文化》，第 32 期(新加坡，2008.06)，頁 103-126。

<sup>22</sup> 張曉威，〈方言群的消長與幫權政治的發展：以十九世紀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為探討中心〉，收入鄭文泉、傅向紅編，《粘合與張力：當代馬來西亞華人族群內關係》(加影：新紀元學院，2009)，頁 23-38；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全球客家研究》，第 9 期(新竹，2017)，頁 159-182。

<sup>23</sup> 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葉氏宗祠，1993)。

<sup>24</sup> 第 118 屆館史編輯委員會，《雪隆惠州會館館史》(吉隆坡：雪隆惠州會館，1996)。

<sup>25</sup> 伍松發編，《雪隆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隆廣肇會館，2007)。

<sup>26</sup> 古燕秋編著，《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吉隆坡廣東義山，2014)。

<sup>27</sup> 《葉姓族譜》影印本，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藏。

雪蘭莪是位於馬來半島中部的馬來王國，在 19 世紀中葉因錫礦開採而開始引入大量華人作為勞動力。後來因為錫礦引發收稅與利益衝突，最終導致雪蘭莪內戰(1867 至 1874 年)。內戰最後由拉惹阿都拉(Raja Abudllah)和葉亞來所領導的海山一派獲勝，並在內戰平息後，雪蘭莪在 1874 年與英國簽約成為英國的保護國(The British Protectorate)，參政司(Resident)制度<sup>28</sup>於隔年出現在雪蘭莪。雪蘭莪因此成為大英帝國在馬來半島上最新的殖民地。<sup>29</sup>

吉隆坡在 19 世紀中葉因雪蘭莪錫礦開採而開始快速發展。雖然在內戰時期幾乎全毀，但是在葉亞來的努力經營下，現代吉隆坡在 1870 年代站穩腳跟，在 1880 年取代巴生(Klang)成為雪蘭莪英殖民政府的首府，更在 1896 年成為馬來聯邦的首都，奠定日後成為馬來西亞首都的基礎。

吉隆坡在 1890 年代時是雪蘭莪錫礦生產的重鎮，佔了雪蘭莪錫礦總產量的八成以上。<sup>30</sup>由於華人是錫礦生產的主要勞動力，因此華人在 1890 年代佔據雪蘭莪總人口的六成到七成之間。<sup>31</sup>1891 年的吉隆坡市共有人口 19,020 人，其中華人共有 13,927 人，佔總人口的 73.2%。如果按照方言群區分，其中客家人佔華人總人口的 51%、廣肇人佔 22%，以及福建人 11%。<sup>32</sup>同時吉隆坡縣華人共有 34,469 人，其中有 71%是客家人、11%是廣肇，以及 8%的

<sup>28</sup> 參政司(Resident)是英國在與馬來半島上的四個王國簽訂合約之後，英國派駐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除了宗教與馬來人事務之外，管理王國其他事務。

<sup>29</sup> J. M. Gullick, *A History of Selangor (1766-1939)* (Kuala Lumpur: MBRAS, 1998), 71.

<sup>30</sup>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104.

<sup>31</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32</sup> Manjit Singh Sidhu, *Kuala Lumpur and its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Surinder Publications, 1978), 13.

福建人。<sup>33</sup>到了 1901 年，吉隆坡市總人口共有 32,381 人，其中華人佔總人口的 71.5%，<sup>34</sup>吉隆坡縣的華人人口則達 54,000 人。<sup>35</sup>這些數據表示，19 世紀末的吉隆坡是一個以華人居多、以客家人為主的城市。這現象直到 20 世紀因為錫礦業衰退，才促成廣肇人人數追上客家人。<sup>36</sup>

葉亞來是第三任雪蘭莪甲必丹，也是建立現代吉隆坡的功臣。他在雪蘭莪內戰之後重新整頓，並且透過惠州會館和仙四師爺廟整合原先在內戰中對立的惠州人和嘉應人，讓佔吉隆坡人口近八成以上的華人得以團結一致。<sup>37</sup>葉亞來在 1885 年過世後，由葉致英(葉石)接任甲必丹，同時廣肇人領袖趙煜成為雪蘭莪華人甲必丹之外的另一名雪蘭莪議會的華人議員。<sup>38</sup>當時華人內部各個次社群<sup>39</sup>在葉亞來過世後紛紛建立自己的會館。其中福建人在 1885 年建立福建會館(前稱福建公司)、<sup>40</sup>赤溪人在葉觀盛的率領下在 1885 年建立赤溪公所、<sup>41</sup>廣肇人趙煜的領導下分別在 1886 年和 1887 年先後建立廣肇會館和關帝廟(在仙四師爺廟之外建立廣肇人自己的宗教場所)、<sup>42</sup>海南人在 1889 年成立

<sup>33</sup>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頁 73。

<sup>34</sup> Manjit Singh Sidhu, *Kuala Lumpur and its Population*, 13.

<sup>35</sup>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頁 73。

<sup>36</sup> 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收入李業霖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頁 161-162。

<sup>37</sup> 張曉威，〈方言群的消長與幫權政治的發展：以十九世紀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為探討中心〉，頁 23-38。這現象也可在馬來半島其他地方見到，參考廖小菁，〈「仙居古廟鎮蠻邦」：拉律戰爭與何仙姑信仰在英屬馬來亞的開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0 期(臺北，2018.06)，頁 47-84。

<sup>38</sup> 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66；Emily Sadka,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1874-1895*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304-305.

<sup>39</sup> 吉隆坡華人社會的內部分畫更加強調地域色彩，無法單以方言區分。因此本文不採用「方言群」，而採用「次社群」來代替。

<sup>40</sup> 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委員會，《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1885-1985)》(吉隆坡：馬來西亞雪蘭莪福建會館，1986)，頁 23-24。

<sup>41</sup> 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66。

<sup>42</sup> 千禧特刊編輯委員會，《吉隆坡廣東義山千禧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2001)，頁 38-43；本刊委員會，《吉隆坡廣肇會館七十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肇會館，1957)；伍松發編，《雪隆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



瓊州會館、<sup>43</sup>潮州人在 1891 年成立了潮州八邑會館(前稱八邑公所)，<sup>44</sup>以及嘉應客家人在 1898 年成立了嘉應五屬會館。<sup>45</sup>換言之，在葉亞來過世之後，吉隆坡強人統治時代結束，吉隆坡華人社會內部變得多元，許多社群開始凸顯自己的特色及不同之處。

1889 年葉致英過世後，葉觀盛出任第五任雪蘭莪華人甲必丹。在英殖民政府遴選雪蘭莪華人的新甲必丹時，葉觀盛、趙煜與葉亞來之子葉韓進同為候選人。雖然葉韓進得到許多商號的支持，<sup>46</sup>但是與英殖民政府關係較差並且非常年輕。同當時是廣肇會館領袖的趙煜，以及身兼廣肇會館領袖和惠州會館會長的葉觀盛相比(惠州會館當時可說是代表吉隆坡所有客家人的組織)，葉韓進的聲勢雖大，但是社會勢力與實力卻遠遠不如。有鑑於葉觀盛的能力稍勝趙煜，並且他得到一些華人商家的支持，更得到印度人和馬來人的支持，<sup>47</sup>以及同時身具廣肇與客家的身份，因此英殖民政府最終選擇葉觀盛出任甲必丹一職。

葉觀盛是來自廣東赤溪的客家人，因獲得葉致英的欣賞與提拔，在當時不但成為雪蘭莪顯赫的華商，<sup>48</sup>同時也是惠州會館和廣肇會館的重要人物。當時雖然已有赤溪公所(1885 年成立)，但是赤溪人仍然參與惠州會館，並且葉

<sup>43</sup> 陳敦川主編，《馬來西亞雪蘭莪瓊州會館慶祝百週年暨天后宮開幕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瓊州會館／天后宮，1989)，頁 2-8。

<sup>44</sup> 編輯委員會，《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八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1977)，頁 18-20。

<sup>45</sup> 特刊出版委員會，《馬來西亞雪蘭莪嘉應會館七十七週年紀念刊》(吉隆坡：雪蘭莪嘉應會館，1980)。

<sup>46</sup> 雖然許多前人研究指出葉韓進得到潮州、福建、廣肇和客家幫的支持，但是按照當時的檔案，是以商號作為單位來計算，因此此處不以方言群，而以商號作為單位。見“Begg that Yap Hon Chin may be Appointed Capt. Chin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5998W; “Recommend Yap Hon Chin for the Capt. Chinship K. Lumpor,”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5999W.

<sup>47</sup> “Petition-Requesting that Yap Kwan Seng may be Appointed Captain China in Selangor,”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8339W;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73-174。

<sup>48</sup> 張竹彤，〈華人生意與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收入謝愛萍主編，《馬來西亞廣東人研究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雪蘭莪廣東會館，2007)，頁 7。

觀盛在葉致英去世後，打敗葉韓進而出任惠州會館會長一職。<sup>49</sup>另一方面，赤溪位於廣肇地區，因此葉觀盛也參加廣肇會館，不但擔任廣肇會館的產業受託人，也是廣肇會館的重要領袖之一。由於葉觀盛這種身兼廣肇與惠州兩大會館的領袖身份，讓他取得甲必丹一職。

葉觀盛成為甲必丹之後，吉隆坡華人的領導權也由惠州人(客家人)轉移至廣肇人(廣府人)。當葉觀盛是甲必丹時，廣肇會館及其控制的關帝廟取代惠州會館和仙四師爺廟，成為處理華人內部糾紛與事務的機構。當時華人內部遇有爭執時，皆交由廣肇會館裁定。這除了因為趙煜在 1885 年被英殖民政府委任為華人法官與雪蘭莪議會成員之外，<sup>50</sup>更因為葉觀盛成為甲必丹，且甲必丹具有處理華人內部事務的權力，因此讓廣肇會館在 1890 年代成為吉隆坡華人的審判所。此外，1892 年趙煜去世後，廣肇人趙煜在雪蘭莪議會的華人代表一職由也是廣肇人的陸佑接替。陸佑當時已經崛起成為吉隆坡新一代的重要華商，並且曾在其手下辦事、後來獨立門戶的陳秀連與陸秋傑等也都是廣肇人(陸佑、陳秀連和陸秋傑是 20 世紀初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的重要領袖)。<sup>51</sup>這不但意味著廣肇會館不但取代惠州會館成為吉隆坡華人社會的領導機構，同時廣肇人在經濟上超越客家人，確立廣肇人在吉隆坡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另一方面，甲必丹的權力在 1885 年之後有所弱化。甲必丹具有管理華人內部大小事務的權力，以及握有行政與司法權。但是在 1885 年時，除了甲必丹葉致英之外，廣肇人領袖趙煜也被英殖民政府賦予雪蘭莪議會議員與華人法官的頭銜，而具有處理華人司法事務的權力。雖然此一權力在 1892 年趙煜過世後被英殖民政府收回，但是另外委任陸佑接任趙煜所留下的雪蘭莪

<sup>49</sup> 第 118 屆館史編輯委員會，《雪隆惠州會館館史》，頁 151；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73-174。

<sup>50</sup> 伍松發編，《雪隆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頁 34-37；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66；Emily Sadka,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304-305.

<sup>51</sup> 編輯委員會，《陳氏書院宗親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陳氏書院，1986)，頁 59。

議會議員一職。<sup>52</sup>換言之，進入後葉亞來時代，英殖民政府透過分散權力的方式，削弱甲必丹的權力。

更為重要的是，雪蘭莪政府在 1890 年設置華民護衛司一職，處理華人事務。<sup>53</sup>1877 年，海峽殖民地率先成立華民護衛司一職，並且立法打擊會黨。<sup>54</sup>華人社群自此不再是國中之國，而是必須接受政府法令的管轄。隨後雪蘭莪在 1890 年設立此官職，管理當地的華人。<sup>55</sup>馬來聯邦成立後，在中央政府層級設立華民政務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一職，管理四邦的華民護衛司。<sup>56</sup>如此一來，雪蘭莪的華民護衛司與甲必丹的部分職務重疊，促成當時的甲必丹葉觀盛必須與華民護衛司好好合作處理華人事務，對華人內部事務的管轄權也被進一步削弱。

雖然英殖民政府從在雪蘭莪設置華民護衛司一事上，可看見雪蘭莪的英殖民政府努力建立現代化政府，但是在執行與實際操作方面仍然落後。雪蘭莪的英殖民政府在 1890 年代開始推動大量立法，除了把行政與司法分開，<sup>57</sup>並設立華民護衛司和開始透過社團註冊法規範華人社團。隨著馬來聯邦的設立，英殖民政府進一步設置各種法律。除了統一四邦的土地法，<sup>58</sup>雪蘭莪也推動公司法、修改警察法、度量衡、郵政、關稅法等等法律，以及設立聯邦

---

<sup>52</sup> 伍松發編，《雪隆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頁 34-37；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66；編輯委員會，《陳氏書院宗親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59；Emily Sadka,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304-305.

<sup>53</sup> 吳佩珊，《英殖民政府對吉隆坡華人事務管理——從自治至法治的轉變(1868-1914)》，頁 61-65。

<sup>54</sup>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頁 47-153。

<sup>55</sup> 莊仁傑，〈殖民統治方法變動的契機：以 1912 年吉隆坡華人騷亂為核心〉，頁 169-174。

<sup>56</sup> Chin Yoon F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of Selangor 1896-1906," 30-32.

<sup>57</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sup>58</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護衛隊等等。<sup>59</sup>雖然這些立法貌似指出雪蘭莪步入現代政府的殿堂，但是實際上並非如此。雪蘭莪參政司在 1897 年的報告書中指出，華民護衛司在保護婦女方面有所進步，但也指出《保護婦女法令》(The Women and Girls' Protection Regulation, 1895)始終有執行不彰的問題，而不是法令本身有問題。時任雪蘭莪華民護衛司的 G. T. Hare 也對此同意。<sup>60</sup>另一方面，雪蘭莪參政司在 1899 和 1900 年的報告書中，指出雪蘭莪政府的官員人數不足，也無法找到適合某些官職的人選。<sup>61</sup>從雪蘭莪的警員人數與人口比較，可知當時的政府無法處理雪蘭莪許多犯罪活動；再加上當時交通因素使得難以進入內陸地區執法，<sup>62</sup>以及民風強悍，因此雪蘭莪犯罪活動非常多。從 1890 年代的報告書中，可發現每年犯罪達到一萬起以上，法庭所要審理的案件也多達近萬件。<sup>63</sup>從以上

<sup>59</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60</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up>61</sup>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62</sup> 當時馬來半島各地都有類似情況，因此警力大多集中在城市地區，越偏僻的地方則無警力配置。甚至在城市地區，也常常因為警力不足而有許多暴力事件發生。見 Cheah Boon Kheng, *The Peasant Robbers of Kedah, 1900-1929*; James F. Warren,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

<sup>63</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可知，雖然雪蘭莪英殖民政府頻頻立法以在雪蘭莪建立現代化政府與統治，但是在實際操作上，卻尚未真正進入現代化。

雖然英殖民政府在 1890 年設立華民護衛司，並在 1894 年在雪蘭莪通過社團註冊法以打擊會黨等非法組織，<sup>64</sup>但如前段所述，由於華民護衛司署的執行力不足與編制有限，所以在治理上非常需要華人甲必丹的協助。自馬來聯邦成立以來，原先擔任雪蘭莪華民護衛司的 Hare 被委任為第一任聯邦華民政務司(日後多任雪蘭莪華民護衛司同時也擔任馬來聯邦的華民政務司與森美蘭的華民護衛司)。<sup>65</sup>在接下來幾年的報告書中，可看見由於這項職務安排的關係，所以雪蘭莪華民護衛司非常忙碌，甚至在 1899 年要求為雪蘭莪華民護衛司增加一位副手。<sup>66</sup>這項要求在第二年實踐，由 Pountney 擔任副華民護衛司。<sup>67</sup>但是，由於華民護衛司的工作忙碌，以及華民護衛司署的編制很小且人手不足，<sup>68</sup>再加上甲必丹在華人社會中的聲望極高，所以在實際操作上需要華人甲必丹的幫助。

當時各資料顯示葉觀盛對英殖民政府有莫大幫助。從政府的行政報告書中可知，華人甲必丹葉觀盛實際上常常協助英殖民政府，在政府運作上扮演

---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64</sup>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up>65</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up>66</sup>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up>67</sup>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68</sup> 從華民護衛司在 1912 年吉隆坡華人騷亂前後所動用的華民護衛司署職員來看，華民護衛司署的人數從幾名到十數名不等。所以可以從此得知在 1890 年代的華民護衛司署的職員人數會更少。見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Chinese disturbances-Protector of Chinese narrative of events,"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162072W; A. M. Pountney, ed.,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London: Darling & Son, LTD, 1911), 22.

重要角色。《雪蘭莪 1895 年行政報告書》(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在司法部分中指出，甲必丹就如往年一樣，(協助司法部門)理清各種複雜關係和其他事項。<sup>69</sup>在下一年的報告書中，則指出華民護衛司在處理華人社會糾紛與執法時得到甲必丹的協助。<sup>70</sup>此外，這些報告書不斷指出，1890 年代的雪蘭莪內陸礦區中，是政府執法與警力難以觸及的地方。<sup>71</sup>由於當時的警力不足，並且雪蘭莪參政司常常抱怨警隊的素質不佳，<sup>72</sup>因此可從中得知為了管理這些以華人為主的雪蘭莪內陸礦區時，不得不依賴甲必丹的力量來處理當地的治安問題(當時葉觀盛和許多華商是吉隆坡的礦主)。另一方面，1897 年曾有一批雪蘭莪華人領袖上書英殖民政府要求表揚葉觀盛，<sup>73</sup>從中也可知作為雪蘭莪華人甲必丹的葉觀盛，對華人社會或英殖民政府而言都是重要人物，有不少華人事務仍然仰賴甲必丹推動。

簡言之，葉觀盛在 1890 年成為甲必丹時，所面對的社會是個不同於過去的吉隆坡華人社會。吉隆坡華人的各個次社群在 1855 年後紛紛成立自己的會館；當時英殖民政府委任趙煜為華人法官，也先後委任趙煜和陸佑出任議會議員一職，使得有華人領袖從單數變複數；同時英殖民政府設立民護衛司一職來管理華人事務。這些都顯示強人領導時代的結束，甲必丹的權力下滑。此外，華人會黨自 1890 年代開始被雪蘭莪英殖民政府打壓，<sup>74</sup>導致葉觀

<sup>69</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sup>70</sup>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sup>71</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sup>72</sup>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up>73</sup> Chin Yoon F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of Selangor 1896-1906,” 32.

<sup>74</sup> 顏清煌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115-119。

盛不能像過去的領袖一樣，依賴會黨的暴力掌控華人社會，而必須尋找新方法。

另一方面，由於雪蘭莪的英殖民政府的治理仍未完全現代化，因此仍然有葉觀盛可發揮影響力的空間。雖然英殖民政府在 1890 年代透過大量立法建立現代化治理，但由於人員缺乏與執行力不足，所以仍然需要依賴甲必丹等舊制度來進行統治。在這情況下，葉觀盛仍然是英殖民政府進行統治的可靠人物，以及華人社會與政府溝通的重要管道。

### 三、葉觀盛面對的挑戰：葉氏宗祠的成立

本節透過雪蘭莪葉氏宗祠的成立及其當時的時空脈絡，指出葉氏宗祠的成立如何挑戰葉觀盛的地位。

雪蘭莪葉氏宗祠在 1892 年組織，並在 1893 年於吉隆坡市中心諧街(High Street, 即今日的李孝式路 102 號)建立宗祠。葉李旺在 1893 年時為了償還債務，因此把在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兩份產業轉讓於葉城和葉岱南。隨後葉城和葉岱南多方奔走與負責籌款，最終不但為葉氏宗祠買下這兩份產業，並成為葉氏宗祠的產業受託人之一。<sup>75</sup>這兩份產業中，地契 572 號為葉氏宗祠所在，地契 571 號則成為葉氏宗祠的產業(祖嘗)，其出租所得供葉氏宗祠使用。<sup>76</sup>在葉城和葉岱南過世後，雪蘭莪第四任華人甲必丹葉致英之子葉隆興，與另一創辦人葉蔚松一同成為葉氏宗祠的產業受託人。<sup>77</sup>有關這三位雪蘭莪葉氏宗祠的創辦人的資料非常稀少，從福建會館的《雪蘭莪福建會館 115 週年紀念

<sup>75</sup> 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83-85、120。

<sup>76</sup> 根據 1952 年葉觀華在葉氏宗祠的登記同宗大會所言，雪蘭莪葉氏宗祠於 1892 或 1893 年成立(根據不同的計算方式所得)。如果以得到地契為成立日，葉氏宗祠成立於 1893 年，但如果以宗祠組織日算起，則是 1892 年成立(最後大會決議以宗祠組織日算起)。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120。

<sup>77</sup> 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55、83-85、120。

特刊》得知，他們三位很可能也是威鎮宮(現在的觀音寺)的創始人。<sup>78</sup>除此之外，當時勢力如日中天的華人甲必丹葉觀盛卻完全沒參與葉氏宗祠的籌措與建立過程。

根據毓光的〈雪蘭莪葉氏宗祠史略〉，雪蘭莪葉氏宗祠的成立與當地葉氏的財富和地位走下坡有關。當葉亞來在世時，許多葉氏族人前往吉隆坡投靠他，當地葉氏因此欣欣向榮。但是當葉亞來過世後，葉氏族人的命運開始走下坡。當時葉亞來遺下的德生號因為不得其人且經營不善而式微，同時其他葉氏商人如葉連及其德發號也因周轉不靈而處境艱難。特別是 1889 年葉觀盛接任雪蘭莪甲必丹後，葉氏族人開始覺得有成立葉氏宗祠的需要。因此，為了避免葉氏族人不會因為前任甲必丹葉亞來與葉致英過世而走下坡，最終導致葉氏凋零；所以葉連的兄弟葉城提議成立葉氏宗祠，期望宗祠可讓異鄉族人記得祖宗、團結與聯絡葉氏族人，也藉此招待宗親與處理宗族福利與協調糾紛。<sup>79</sup>雖然這篇文章貌似揭示葉觀盛被其他吉隆坡的葉氏族人排斥，但是此文的成文年代是 1972 年，所以其中內容必須得到其他的證據來佐證。

雖然《葉姓族譜》的考訂完成於惠州會館，但是從中可看出當時雪蘭莪葉氏宗祠的部分情況。《葉姓族譜》在 1895 年(光緒乙未年)由葉雲植考訂，1910 年(宣統庚戌年)重刊。其中以惠州的沙坑葉氏族譜為主軸(即葉亞來的原鄉)，不但追溯其祖先至嘉應的葉氏，更上溯至葉姓得姓祖。最為關鍵的是，其也往下追溯至葉亞來及其子孫。在族譜的最後增加葉亞來及其子孫的名字、生卒年份、婚姻對象與子女等相關訊息。其中葉亞來有詳細記錄之外，

<sup>78</sup> 英殖民政府在 1919 年於憲報上公佈威鎮宮屬於福建人的祭祀場所，直至今日。因此，許多人認為葉城、葉岱南和葉蔚松是福建人。但是從《雪隆惠州會館館史》可知，葉蔚松因曾擔任產業受託人，因此應該是惠州人。有鑑於此，現今被視為是福建人創立的觀音寺，三位發起人可能是惠州人。又或者部分發起人是福建人。見第 118 屆館史編輯委員會，《雪隆惠州會館館史》，頁 146-148；雪蘭莪福建會館《115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雪蘭莪福建會館 115 週年紀念特刊(1885-2000)》(吉隆坡：雪蘭莪福建會館，2001)，頁 68-69。此觀察與推論，感謝馬來亞大學的林德順博士所提供的資料與討論。

<sup>79</sup> 毓光，〈雪蘭莪葉氏宗祠史略〉，《中國報》，1972 年 8 月 6 日。轉見於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83-85。



葉韓進也詳細記錄下來。換言之，這份族譜是以葉亞來及其後裔為核心的葉氏族譜。<sup>80</sup>

結合這些資料，可發現從葉氏宗祠的成立到族譜的編訂，都和當時實力如日中天的葉觀盛沒有關係。在廣東，同樣姓氏的人會進行聯宗，透過在廣東省城廣州建立合族祠，祭祀共同祖先與修訂共同的族譜，以結合廣東各地的同姓人群來壯大聲勢，並藉此謀求福利與利益。<sup>81</sup>為了達成這目的，通常同姓族人中的聲勢鼎盛者或著名的同姓祖先，常成為同姓人聯宗時的聯宗對象或共同的連接點。<sup>82</sup>可是吉隆坡葉氏宗祠的建立過程沒有積極尋求葉觀盛的支持；《葉姓族譜》雖然追溯至得姓祖，但聯宗過程卻沒有嘗試連接惠州葉氏與赤溪葉氏，更未提及葉觀盛。因此，可從中斷言，當時葉觀盛被其他雪蘭莪當地的葉氏族人排斥，即使他的身份地位可能為當地葉氏族人帶來極大好處。

葉觀盛被排斥，必須從當時吉隆坡華人社會的脈絡說起。首先是惠州人（特別是葉氏）在葉觀盛時代時的動向。葉亞來與其繼承者葉致英是惠州人，他們不但是惠州會館的會長，並且在他們擔任甲必丹時，惠州會館和仙四師爺廟是吉隆坡華人的中心。但是在葉致英過世後，惠州會館會長一職卻由來自台山赤溪的客家人、與惠州葉氏關係較為疏遠的葉觀盛所繼承。葉致英過世後，葉觀盛、葉韓進和趙煜一起競爭雪蘭莪甲必丹。但最終英殖民政府選擇葉觀盛而不選擇在華人圈子中呼聲很高的葉韓進。<sup>83</sup>因此，葉觀盛成為惠州會館會長，可說是惠州葉氏與葉觀盛之間的第一道裂痕。再加上立場較傾向廣肇會館的葉觀盛成為新任甲必丹，使得惠州人對葉觀盛更有意見。在此情

<sup>80</sup> 《葉姓族譜》影印本。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藏。

<sup>81</sup> 黃海妍，《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清代以來廣州合族祠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8）。

<sup>82</sup> 蔡志祥，〈選擇的記憶：以《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收入饒偉新主編，《族譜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115-126。

<sup>83</sup> “Begg that Yap Hon Chin may be Appointed Capt. Chin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5998W; “Recommend Yap Hon Chin for the Capt. Chinaship K. Lumpor,”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5999W; “Petition-Requesting that Yap Kwan Seng may be Appointed Captain China in Selangor,”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18339W.

況下，因此可以推敲出，原先支持葉韓進的惠州人，特別是葉氏族人，成為惠州會館內的少數，也觸發他們另外組織葉氏宗祠。

另一方面，廣肇會館取代惠州會館，成為當時吉隆坡華人社會新的權力中心，有很高的可能性讓惠州葉氏族人有所不滿。葉觀盛是赤溪人並是廣肇會館的一員；加上當時擔任雪蘭莪議會議員的趙煜，以及在 1892 年替補趙煜的雪蘭莪議會議員一職的廣肇人陸佑，都不斷確定廣肇會館成為新的權力中心。因此從 1890 年開始，許多吉隆坡華人社會內部的糾紛，就由廣肇會館負責處理。<sup>84</sup>從這變化來看，可知惠州會館在吉隆坡華人社會中的領導地位，已經由廣肇會館所取代。這些看在佔據當時吉隆坡華人社會約半數的惠州人眼中，想必不是滋味。

雖然一些惠州葉氏族人不滿他們在雪蘭莪華人社會中地位下降，但是他們的社會資本和不滿程度並未促成他們退出惠州會館。例如創辦人之一的葉蔚松除了是葉氏宗祠的產業受託人之一，在 1905 年時也成為惠州會館的產業受託人。這顯示葉氏宗祠的一些人不但沒有離開惠州會館，並且仍積極參與惠州會館的事務。<sup>85</sup>

從此可推知，當他們的不滿無法宣洩時，於是組織葉氏宗祠，並排擠葉觀盛表示不滿。雖然葉觀盛是甲必丹，同時也是惠州會館和赤溪公所的會長，但是對於他把雪蘭莪華人社會的權力中心從惠州會館轉移到廣肇會館，仍然引起惠州會館部分成員——特別是以葉韓進等人為首的惠州人——的不滿。對此他們在成立宗祠的過程中不尋求葉觀盛的協助與支持，也在宗祠的各種活動中不把葉觀盛列入其中。葉觀盛也得知這些事情，因此主動示好。在葉氏宗祠完成之後，除了捐獻一千元，也贈送一盞六角宮燈予葉氏宗祠。<sup>86</sup>

簡言之，葉氏宗祠的成立，極高可能是與惠州會館中的葉氏族人不滿葉觀盛成為惠州會館會長和甲必丹有關。由於他們大多支持葉韓進，因此當不被認為是自己人的葉觀盛掌握大權時，感到勢力不保，因此建立葉氏宗祠。

<sup>84</sup>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59-182。

<sup>85</sup> 第 118 屆館史編輯委員會，《雪隆惠州會館館史》，頁 146-148。

<sup>86</sup> 毓光，〈雪蘭莪葉氏宗祠史略〉，頁 83-85。

雖然葉觀盛過世之後，葉氏宗祠承認葉觀盛的地位，其後人也是葉氏宗祠的成員，<sup>87</sup>但是這些事情顯示葉觀盛並非人人都支持。從上一節中可知 1897 年一群華人要求英殖民政府表揚葉觀盛，因此葉觀盛如何有所作為，並豎立自己在吉隆坡華人社會的權威？

#### 四、葉觀盛的解套方法：廣東義山與同善醫院

面對廣東社群中一部分人的離心，葉觀盛並不消極被動，而是主動出擊以各種方法重新團結廣東社群與華人社會。本節以葉觀盛如何取得行政所需要的資源，以及透過同善醫院和廣東義山這兩個機構，嘗試說明葉觀盛在無法使用暴力的情況下，如何主動統合廣東社群，豎立自己的權威與鞏固自己的地位。

葉觀盛藉由自己的商業眼光，取得許多商業優勢與利益。葉觀盛獲得葉致英的賞識與邀請，在 1870 年從芙蓉(Seremban)移居吉隆坡，成為葉亞來陣營中的一員。雪蘭莪內戰結束之後自立門戶成為錫礦商，在 1889 年時已經成為最大的錫礦家之一，礦場不但分佈間征(Kanching)、士拉央(Selayang)、安邦(Ampang)、沙登(Seri Kembangan)等地，並且聘用勞工多達七千人。<sup>88</sup>在彭亨戰爭(the Pahang War)<sup>89</sup>期間，葉觀盛為英國軍隊提供糧食、日用品及運輸服務。這不但獲得大量利益，並且藉此與英殖民政府建立良好關係，為日後進一步

---

<sup>87</sup> 另一方面，今日葉氏宗祠內，除了供奉葉氏祖先的牌位之外，也供奉葉亞來、葉致英和葉觀盛的牌位。懸掛葉亞來和葉致英的銜勳牌額之外，也懸掛葉觀盛的甲必丹銜勳牌額。從此擺設中得知，葉氏宗祠承認葉觀盛是其重要祖先之一。葉觀盛的子嗣葉大池是葉氏宗祠的成員，並自 1938 年起長期擔任葉氏宗祠的產業受託人之一。見雪隆葉氏宗祠一百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馬來西亞雪隆葉氏宗祠成立一百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隆葉氏宗祠，2015)，頁 74-77；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頁 54。

<sup>88</sup> 顏清煌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158。

<sup>89</sup> 由於彭亨內陸地區的馬來貴族不滿英國在彭亨設立參政司制度(即把彭亨納為英國殖民地)，因此在 1891 至 1895 年之間進行公開的武力反抗，此反抗被稱為「彭亨戰爭」。見 Reynaldo Ileto, "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2, pt. 1, ed. Nicholas Tarl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7.

合作提供基礎。同時葉觀盛的生意不限於吉隆坡，他也在新加坡開設商行新興泰從事買賣。<sup>90</sup>

葉觀盛也善用甲必丹的身份來取得商業優勢。葉觀盛雖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是在擔任甲必丹初期面對現金流不足的問題，並被人們認為無力承擔甲必丹一職。<sup>91</sup>因此他在 1890 年向英國政府申訴，說明作為甲必丹必須擁有大量財力才可好好照顧華人社群，但他卻缺乏現金進行相關活動，所以要求英殖民政府給予他更多的商業利益。最後，英殖民政府答應他的要求，把好些礦場給予他開採。<sup>92</sup>此外，葉觀盛在 1892 到 1894 年以甲必丹的身份取得鴉片和酒的餉碼權，並且在 1893 到 1895 年也在吉隆坡開設賭館和當舖（這代表他取得相關的餉碼權，或者向相關餉碼的承包商取得營運權），賺取豐厚利潤。<sup>93</sup>這些資金的取得不但讓葉觀盛獲利甚豐，同時也取得許多資源來領導當地華人社會。

自 1880 年代起，吉隆坡人口快速增長，但是吉隆坡的公共衛生與醫藥設施卻趕不上相關需求。吉隆坡始終面對房屋不足與住屋過度擁擠的問題，同時衛生條件很差，例如排水與排污設施不足或常常阻塞，引起各種衛生問題。<sup>94</sup>另一方面，由於吉隆坡及其鄰近地區是雪蘭莪的主要錫礦開採區馬來半島地處熱帶，環境濕熱，再加上當時雪蘭莪的礦區屬於開墾的前線，並且 19 世紀馬來半島的衛生與醫療條件不佳，<sup>95</sup>因此也有許多相關的熱帶疾病如腳氣病(beri-beri)、腹瀉(Diarrhoea)與霍亂(Cholera)等。這些疾病在當時沒有有效

<sup>90</sup> 張竹彤，〈華人生意與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頁 7。

<sup>91</sup> 張竹彤，〈華人生意與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頁 7。

<sup>92</sup> 當時規定，錫礦開採的土地必須向政府承租，才可合法開採。

<sup>93</sup>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65-166。

<sup>94</sup> Lenore Manderson, *Sickness and the State: Health and Illness in Colonial Malaya, 187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1-114; Richard Baxstrom, *Transforming Brickfield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a Malaysian C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25-53.

<sup>95</sup> 東南亞熱帶疾病的情況嚴重，直到 20 世紀才有所緩解。參考 Lenore Manderson, *Sickness and the State*; Robert E. Elso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e State and Society: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2, pt. 1, ed. Nicholas Tarling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5-178.

的治療方式，並且常常成為雪蘭莪最致命的流行病，死亡率可高達三成。<sup>96</sup>此外，當時的吉隆坡華人佔多數，並且是個男多女少的性別失衡的社會。嫖妓之風因此盛行，也促成梅毒等性病的流行。<sup>97</sup>

因此，雪蘭莪政府透過立法、公共工程與設立醫藥設施等以應付當時人們對公共衛生與醫藥的需求。當時雪蘭莪政府透過立法、規劃墳場與改善居住環境，以及開設研究中心與公立醫院，處理當時各種頗為流行的熱帶疾病與性病。例如成立平民醫院(Pauper Hospital)醫治大眾百姓，同時葉觀盛等也捐助政府，在平民醫院中設立大華樓(Tai Wah Ward)照顧重病者。<sup>98</sup>

在政府籌辦的醫院之外，也有民間人士所籌辦的醫院，同善醫院的前身——培善堂就是其中之一。培善堂是葉觀盛在 1882 年獨資建立的醫藥設施，為吉隆坡各方有需要的人士「贈醫施藥，及施棺助葬等」。<sup>99</sup>培善堂類似當時中國各

<sup>96</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sup>97</sup> J. 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85-92.

<sup>98</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Lenore Manderson, *Sickness and the State*, 9-10, 101-114; Richard Baxstrom, *Transforming Brickfield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a Malaysian C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25-53;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59-182；李業霖，〈吉隆坡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葉觀盛〉，收入李業霖，《讀史與學文》(吉隆坡：紅蜻蜓，2010)，頁 185。

<sup>99</sup> 雖然現在許多文獻都說培善堂在 1881 年成立，但是根據〈同善醫院開幕誌盛〉中提及葉觀盛在壬午年成立培善堂，因此應該是 1882 年。此外，其中也提及同善醫院在乙未年開幕，因此正確開幕年份應為 1895 年，而不是現今所說的 1894 年。見資料室，〈雪蘭莪同善醫院史略〉，收入同善醫院出版特刊委員會，《同善醫院特刊》(吉隆坡：同善醫院，1962)，頁 37-38；議案部，〈同善醫院開幕誌盛〉，收入同善醫院出版特刊委員會，《同善醫院特刊》，頁 38-39；J. 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94-95.

地的善堂。善堂是中國明清時期出現的慈善組織，最初是由紳商在城市所創立的慈善組織，為窮苦大眾提供免費的醫藥與喪葬服務。<sup>100</sup>雖未有記錄顯示葉觀盛設立培善堂的構想來自何處，但是當時善堂常見於廣東各地，<sup>101</sup>並且新馬華人社會有富人為大眾提供免費醫藥的傳統，<sup>102</sup>因此可知這些影響促成葉觀盛設立培善堂。

1895年，培善堂從葉觀盛獨資贊助的慈善機構改組成由華商共同出資贊助的非營利機構，並且改名為同善醫院。由於求醫人數日增，即使葉觀盛的財力可觀，但仍難以如此持久下去，因此舉行會議討論應如何維持此一慈善機構。在會議上，決議把培善堂改組成同善醫院。<sup>103</sup>當時陸佑建議改組培善堂成公共機構，並且由華商共同出資，也率先捐款一千元。隨後陳秀連等吉隆坡華商都踴躍捐輸，為同善醫院累積大量善款。葉觀盛隨後也捐出一間店屋，以其租金作為同善醫院的收入。由於這些大量善款和長期資助，同善醫院因此進行擴建，以容納更多病人。<sup>104</sup>

除了從葉觀盛獨資捐款變為吉隆坡所有商人共同捐助，同善醫院在管理上廣納其他華社領袖，並且接受政府的監督與協助。同善醫院成立一個以葉觀盛為首的管理委員會，內有十位經理／主席(Original Manager/President)與十九位協理(Original Assistant Manager/member of committee)協助葉觀盛管理這組織。同時也訂立章程，詳述同善醫院的成立原因與管理辦法，並向政府登記在案。<sup>105</sup>自此開始，同善醫院不但出現在政府的年度報告書中，也被正式納入成為當

<sup>100</sup> 夫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sup>101</sup> 毛迪，〈慈善？迷信？——1929-1936年廣東中山縣民間慈善團體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sup>102</sup> 這些組織有許多，例如新加坡的陳篤生創辦的陳篤生醫院(Tan Tock Seng Hospital)。見顏清煌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43-45；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90-111.

<sup>103</sup> “Tung Shin Hospital at Pudoeh-Asks for a little Deed for the Site Granted by Government,”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58910W.

<sup>104</sup> 資料室，〈雪蘭莪同善醫院史略〉，頁37-38。

<sup>105</sup> “Tung Shin Hospital at Pudoeh-Asks for a little Deed for the Site Granted by Government,”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58910W.

地醫療體系的一部分，並凸顯政府對同善醫院的重視。政府甚至在 1896 年為同善醫院保留一份約 5 英畝的土地供其未來發展。<sup>106</sup>同善醫院的情況非常類似香港的東華醫院，都是由華商所成立的民間醫藥機構，但以章程等方式明訂章程與管理辦法，並接受政府的監督。<sup>107</sup>

同善醫院在 1895 年 11 月啟用。根據當年的政府年度報告，同善醫院是家設備完善且符合官方要求的中醫醫院。當時的同善醫院一共有 50 張病床，雖然採用中醫療法，並且病人以華人為主，但是管理者是一位可用英文溝通與記錄的華人，並且其設備等與西醫醫院並無分別，病人也得到妥善照顧。英殖民政府對此情況表示滿意。<sup>108</sup>

1895 年，同善醫院舉行開幕典禮，英殖民政府官員和華人領袖皆出席，無形中肯定葉觀盛的領導地位。當時的「署理參政司夫婦，建造司夫婦，稅務司夫婦，礦務局總辦夫婦，總巡捕官夫婦，巡理廳夫婦，華民政務司<sup>109</sup>夫婦，以及皇家大醫生，大牧師，火車站總辦，刺督，量地官夫婦及公子等，華人領袖甲必丹葉觀盛，陸佑，葉進福，黃合利，高秀山，陳秀連，錢俊遐，黃三，楊才，葉大鳳，方啓崇，陳偉，戴富，蕭宗，葉勵臣，歐陽材，王天全，黃合龍，辛炳，司徒光，李奇仁，洪承爵，海源號(按：其代表)，林大斗，溫日新，葉蘭，永福生號(按：其代表)，譚友生，錢仁，王聚秀，羅上才等君」出席。<sup>110</sup>基本上，這集合當時吉隆坡重要政府官員，以及吉隆坡當時許多華人領袖，顯示葉觀盛不只能夠聚集一批吉隆坡華商共同為華人社會謀福利，同時顯示英國官員們也支持他對華人社會的領導權。

<sup>106</sup> “Tung Shin Hospital at Pudo-Asks for a little Deed for the Site Granted by Government,”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1957/0058910W.

<sup>107</sup> 有關香港東華醫院的研究，可見 Elizabeth Yuk-ye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sup>108</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sup>109</sup> 有鑑於當時馬來聯邦尚未成立，因此此處的華民政務司應該是華民護衛司，而不是隸屬馬來聯邦體制下的華民政務司。

<sup>110</sup> 議案部，〈同善醫院開幕誌盛〉，頁 38-39。

開幕禮的儀式也盡顯葉觀盛的領導權力。在署理參政司夫人開幕之後，由華人英語代表致辭歡迎各方出席。隨之則先後由署理參政司 J. P. Rodger 和葉觀盛致辭。最後以署理參政司夫人植樹，並燃放爆竹，即告禮成。最後則是晚宴，直到晚上。<sup>111</sup>這過程不但顯示葉觀盛的影響力和領導力，也藉此鞏固他對吉隆坡華社的領導地位。署理參政司夫婦出席，並且擔任開幕人與致辭人，顯示葉觀盛得到殖民政府的支持，更可拉攏華人對他的支持。當時也有許多華商出席並見證此事，消息傳開後，將進一步鞏固他在華社中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許多華社領袖的出席，也可讓英殖民政府見識他對華社的影響力，進而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葉觀盛這些作為，都將讓惠州葉氏等人對他心悅誠服，進而鞏固他對吉隆坡華社的領導。<sup>112</sup>

更為重要的是，同善醫院的擴建招來更多華商一同出錢出力，這可拉抬葉觀盛的聲勢。這些新加入同善醫院的華商在之前都與葉觀盛有一定的關係或者溝通良好。例如陸佑與陳秀連也同葉觀盛一樣是來自廣肇會館的華人領袖與商人。他們的加入不但有利於他們自己的名聲，也連帶把他們的影響力和人脈帶入同善醫院，這將更有利於身為同善醫院主導者的葉觀盛，讓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同時同善醫院是家慈善醫藥機構，因此讓葉觀盛可進一步直接施予恩惠並接觸到吉隆坡各族群中的窮苦大眾，讓更多人支持他。

除了同善醫院，廣東義山是另一個葉觀盛積極主動促成的事務。1895 年英殖民政府在政府報告書中公佈，撥出 215 英畝的土地作為廣東義山的墓地，<sup>113</sup>這被視為是廣東義山的開始。實際上，在廣東義山被政府規劃為墓地之前，在吉隆坡死去但無法運回家鄉安葬的屍骨，都葬在吉隆坡地勢較高的荒郊野外。因此，吉隆坡地勢較高的地方都成為當時人們安葬的地方。<sup>114</sup>雖然廣東

<sup>111</sup> 議案部，〈同善醫院開幕誌盛〉，頁 38-39。

<sup>112</sup> 華人領袖或團體透過公開場合與慶典展示自己權力，並且顯示自己是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橋樑，是新馬華人社會至今為止皆可見到的現象。見莊仁傑，〈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遊神為個案〉，頁 1-42。

<sup>113</sup>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編委會，〈廣東義山簡史〉，收入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1995），頁 59。

<sup>114</sup> 編委會，〈廣東義山簡史〉，頁 59。



義山在 1895 年才被規劃為墓地，但是廣東義山最早的墓碑上的年份為 1878 年，<sup>115</sup>至今仍留存兩座分別在 1884 年和 1891 年豎立的墓碑，<sup>116</sup>以及培善堂／同善醫院也有施棺與安葬的慈善目的，<sup>117</sup>因此廣東義山所在地原先就有埋葬死者。此外，英殖民政府治理下的馬來半島各地的城市都面對公共衛生的問題，政府也試圖用各種方法改善這一問題。雪蘭莪的英殖民政府除了設置潔淨局(Sanitary Board)負責籌劃吉隆坡的排水與排污系統等事情之外，也開始規劃墳場，減少與屍體接觸所引發的衛生問題。<sup>118</sup>因此可推知，廣東義山在 1895 年成立，是把過去非正式的墳場，改為政府承認的合法墳場。這不但解決衛生問題，也為當地華人謀求福利。

雖然廣東義山有五位公認的發起人——葉亞來、葉致英、趙煜、葉觀盛和陸佑，<sup>119</sup>但由於廣東義山建立時，葉亞來、葉致英和趙煜已經過世，因此廣東義山真正的發起人只有葉觀盛和陸佑。廣東義山自 1907 到 1915 年之間的十位董事名單中，包括葉觀盛的商號新就記和陸佑的商號東興隆；<sup>120</sup>再加上他們是廣東義山的發起人，因此他們二人很可能自成立之初就是董事會的成員，甚至在其過世後仍然由其代表擔任董事。<sup>121</sup>

從廣東義山現存最早的董事名單中可知，廣東義山成立初期是由個人或商號組成董事會，而不以次社群的會館作為選任管理層的標準。現今以六家會館——廣肇會館、惠州會館、嘉應會館、瓊州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和茶陽會

<sup>115</sup> 編委會，〈廣東義山歷年大事記〉，收入吉隆坡廣東義山，《吉隆坡廣東義山八十三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廣東義山，1978)，頁 95。

<sup>116</sup> 古燕秋編著，《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頁 40-41。

<sup>117</sup> 資料室，〈雪蘭莪同善醫院史略〉，頁 37-38。

<sup>118</sup> Lenore Manderson, *Sickness and the State*, 96-126; Brenda S. A. Yeoh, *Contesting Space in Colonial Singapor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281-311.

<sup>119</sup> 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頁 26-35。

<sup>120</sup> 廣東義山在 1907 年的資料並無留存。

<sup>121</sup> 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頁 26-35。

館<sup>122</sup>——推派代表組成廣東義山的做法是從 1937 年開始。<sup>123</sup>因此可推知廣東義山早期是由葉觀盛等粵籍華人領袖所掌控，而會館共組董事會管理義山是後來的做法，並且這是從今日思維——認為會館是代表某一華人社群的思維——解釋歷史的結果。各個華人次社群的財力狀況可見於當時籌款興建義山設施一事中，也顯示廣肇會館與葉觀盛掌控當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義山建立時的費用，分別由廣肇會館籌得 4,000 元、瓊州會館 1,000 元、潮州八邑會館 600 元、惠州會館 480 元，以及赤溪公所 280 元。<sup>124</sup>從此可見廣肇會館的經濟能力遠大於其他會館，換言之廣肇社群的影響力也最大。另一方面，惠州會館只及廣肇會館所籌款項的約十分之一，再加上陸佑和葉觀盛是廣東義山的真正發起人，因此可得知惠州會館的勢力已經衰退。在此情況下，由於惠州會館的經濟能力大不如前，再加上因處理華人事務的功能已轉移至廣肇會館，<sup>125</sup>所以即使部分惠州人不滿葉觀盛，也無法與之對抗，甚至可能必須依靠葉觀盛以惠州會館會長的身份，為其發聲。

從以上的資料可一窺廣東義山的建立情況。葉觀盛擔任甲必丹時，在陸佑的幫助下成立廣東義山。在他們的帶動下，廣肇會館對籌建廣東義山設施方面的資助遠遠超過其他會館。從廣東義山強調葉觀盛等人為發起人，並且由其商號長期擔任廣東義山的董事，可知葉觀盛在廣東義山的管理層中的地位甚高。由於廣東義山是當時廣東人唯一的義山，因此葉觀盛可說控對華人社會而言很重要的喪葬事宜，並且這對其聲望的建立與鞏固領導權不無幫助。

葉觀盛為何要把培善堂擴大成為同善醫院，以及建立廣東義山？除了葉觀盛像其他華人領袖一樣，透過各種慈善事業建立自己威望之外，<sup>126</sup>也可從

<sup>122</sup> 廣肇人的廣肇會館成立於 1886 年、惠州人的惠州會館成立於 1864 年、嘉應人的嘉應會館成立於 1898 年、海南人的瓊州會館成立於 1889 年、潮州人的潮州八邑會館成立於 1891 年，以及大埔人於 1878 年成立茶陽會館。

<sup>123</sup> 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頁 36-58；編委會，〈歷屆董事會會館代表〉，收入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頁 132-142。

<sup>124</sup> 編委會，〈廣東義山簡史〉，頁 59。

<sup>125</sup>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頁 159-182。

<sup>126</sup> 顏清煌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43-45；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90-111.

文化角度解釋。許多華人南來，都必須面對生死的課題，以及身亡後是否有人祭祀的問題。當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也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因此，葉觀盛成立的同善醫院與廣東義山為人們提供醫藥與喪葬的服務，解決人們在生死問題的煩惱。廣東義山不但提供喪葬服務，也有舉行法會解決死後是否被祭祀的問題。<sup>127</sup>當葉觀盛解決吉隆坡華人社會中這些重大課題，對其聲望以及支持度無疑有巨大幫助，並且可藉由掌握對華人非常重要的醫藥與喪葬事務，進而不需要依賴暴力來掌控吉隆坡華人社會。

綜上所述，同善醫院和廣東義山的建立，對葉觀盛在吉隆坡華人社會——特別是廣東社群——豎立聲望非常有幫助。同善醫院不只獲得其他華商的支持，也獲得政府的背書，顯示葉觀盛獲得政府與民間的支持，更進一步鞏固其領導地位。廣東義山是處理喪葬事務的重要場所，葉觀盛的新就記長期擔任廣東義山的董事，並且廣肇會館在籌建義山設施時出力甚多，都有助於廣肇領袖葉觀盛在華人社會中建立名聲。雖然並無文獻記錄可考究葉觀盛設立這些機構的目的，但是從當時華人對於醫藥福利的實際需要，以及喪葬與祭祀的心理需求，可推知葉觀盛以這些機構滿足當時吉隆坡華人社會的需求，進而不需要依靠暴力也能贏得人們的支持。

## 五、結論

葉觀盛繼葉亞來和葉致英之後，成為第五任雪蘭莪華人甲必丹。但是，他要面對的吉隆坡華人社會與過去有所不同。首先是吉隆坡華人社會成為一個多元的社會。內部的次社群開始強調自己的不同之處，建立自己的會館。福建會館、赤溪公所、廣肇會館、潮州八邑會館和嘉應會館等紛紛在葉亞來過世後的 19 世紀末紛紛建立。當時的英殖民政府也先後委任趙煜和陸佑為

<sup>127</sup> 顏清煌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頁 43-45；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90-111; 蔡志祥，〈孝道與宗教慈善：新加坡義安城的濟幽法會與潮人族群傳統的再造〉，收入張禹東、莊國土主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第 2 輯，頁 195-210。此外，這些想法也來自黃裕端老師的研究心得。某次與黃老師交流時，黃裕端老師對 19 世紀華人社會的觀察提出以上內容。

雪蘭莪議會議員，甚至趙煜也同時擁有華人法官的頭銜。這表示葉亞來的強人統治時代結束，甲必丹處理華人內部事務時不再是自己獨自一人就可拍板決定。

第二是華人社會的核心團體從惠州人轉移到廣肇人。不但屬於廣肇人士的葉觀盛和趙煜被政府委任為處理華人事務的官員，葉觀盛也更為強調自己是廣肇人。除了趙煜和葉觀盛，陸佑和陳秀連等廣肇籍富有華商也在當時嶄露頭角。同時從廣東義山成立一事等來看，廣肇的經濟實力已遠遠大勝其他次社群。

更重要的是，馬來半島的英殖民政府自 1880 年代開始落實直接統治，削弱甲必丹的權力。雪蘭莪的英殖民政府在 1890 年設置華民護衛司一職，隨後在 1894 年通過社團註冊法以打擊華人會黨和暴力。因此葉觀盛無法像前四任的甲必丹一樣，能夠透過會黨及其暴力控制華人社會，而必須與華民護衛司與其他華社領袖好好合作。

雖然華民護衛司署的成立象徵著英殖民政府對華人事務的直接管理，但由於官員人數不足，以及新政策從頒布到實際落實之間會有時差，再加上當時吉隆坡華人眾多，因此英殖民政府在許多時候仍然必須依賴甲必丹葉觀盛治理華人社會。例如在 1890 年代的報告書中，就有好幾處提及甲必丹協助英殖民政府施政。此外，1897 年的華人領袖們也要求政府公開表揚葉觀盛，以感謝他對華人社會的貢獻，但因為當時殖民政府努力凸顯自己能夠有效地治理華人，因此拒絕這一提議。<sup>128</sup>但從這些事跡可知，雖然英殖民政府試圖降低華人甲必丹的影響力，並在許多地方避免提及他，但是在許多地方上仍然不得不依賴甲必丹的協助。

另一方面，葉觀盛透過自己的豐厚財力，以及各種慈善活動，來維持自己的地位與權力。葉觀盛在成為甲必丹之前已經是吉隆坡華人社會中的大礦家，隨後更透過高明的經商手腕與英殖民政府做生意，並且以甲必丹的身份取得餉碼權，讓自己的經濟能力大幅度提升。這讓葉觀盛有更多的財富可以支配，處理華人的事務。

---

<sup>128</sup> Chin Yoon F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of Selangor 1896-1906," 32-33.

在慈善活動方面，葉觀盛積極投入有關生死議題的醫藥與喪葬事業。他把原先自己獨立經營的培善堂擴大成同善醫院，同時拉攏更多的吉隆坡華人富商加入，藉此平台整合當時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領袖，並提高自己的聲望；也藉著英國政府官員出席開幕典禮拉抬自己的聲勢，鞏固自己對吉隆坡華人社會的領導權。同時在擔任甲必丹時成立廣東義山，處理華人非常注重的喪葬事務，因此這無形中也提升葉觀盛對吉隆坡華社的掌控。

雖然如此，但是也有一些例外。1892年成立的葉氏宗祠，可說是不滿葉觀盛的惠州葉氏族人所另外成立的組織。雖然他們沒把不滿直接表現出來(例如成立另一個惠州會館)，葉觀盛也透過贈禮向他們示好，但是這顯示葉觀盛作為當時的華社領袖，仍然有力所未及的地方。

綜上所述可知，在馬來半島上的英殖民政府在 1890 年代開始推動直接統治，但由於政策時差的關係，所以 1890 年代的雪蘭莪是個新舊制度並存的地方。當負責治理雪蘭莪華人的華民護衛司署成立時，代表舊制度的甲必丹仍然在運作中。可是由於當時華人社會進入多元領袖時代，以及暴力被禁止使用，因此甲必丹在繼續執行其政治任務與影響力時，必須面對更多的挑戰。從葉觀盛的個案可知，雖然面對多元領袖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甚至也有一些人不滿他的領導(葉氏宗祠)，但是他在這直接統治尚未完全落實的時刻(英殖民政府仍然依賴他來治理華人社會)，首先透過與英國殖民政府打好關係，並擴大自己的財務能力，且掌控當時的重要社會機構(同善醫院和廣東義山)，也允許其他華商一同參與這些機構的管理，進而鞏固自己的地位與領導權，繼續領導吉隆坡華人社會。

1890 年的吉隆坡華人甲必丹葉觀盛並非孤例，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發展。在 19 世紀的檳城，原先佔有經濟優勢的邱公司等機構開始衰弱。他們無法像以往那般，依靠暴力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和領袖地位。反之，他們開始依賴法律、社團組織與關係網絡，繼續維護自己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及權力。<sup>129</sup> 因此可知，面對英殖民政府設立華民護衛司一職以進一步直接治理華人社會、取締會黨以禁止暴力經濟、更多的華人領袖與新社會組織出現，以及缺

<sup>129</sup>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乏統一的領袖機構的情況下，當時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華人社會領袖只能依靠自己的財富、與政府的良好關係，以及拉攏更多的華社領袖，以確保自己的權力與地位得以保持。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與文獻

- “Administration Report of the State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5,”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79W.
- “Annual Report by the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6,”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0W.
- “Annual Report by the Acting British Resident of Selangor for the Year 1897,”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1W.
- “Begg that Yap Hon Chin may be Appointed Capt. China,”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Accession NO.: 1957/0015998W.
- “Chinese disturbances-Protector of Chinese narrative of events,”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Accession NO.: 1957/0162072W.
- “Petition-Requesting that Yap Kwan Seng may be Appointed Captain China in Selang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Accession NO.: 1957/0018339W.
- “Recommend Yap Hon Chin for the Capt. Chinaship K. Lumpor,”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Accession NO.: 1957/0015999W.
-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8,”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2W.
-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899,”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3W.
- “Selangor Administration Report for the Year 1900,”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Accession NO.: 2006/0012984W.
- “Tung Shin Hospital at Pudoh-Asks for a little Deed for the Site Granted by Government,”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jabat, Accession NO.: 1957/0058910W.

- 《葉姓族譜》影印本，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藏。
- 千禧特刊編輯委員會，《吉隆坡廣東義山千禧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2001。
- 本刊委員會，《吉隆坡廣肇會館七十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肇會館，1957。
- 古燕秋編著，《死生契闊——吉隆坡廣東義山墓碑與圖文輯要》，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吉隆坡廣東義山，2014。
- 同善醫院出版特刊委員會，《同善醫院特刊》，吉隆坡：同善醫院，1962。
- 吉隆坡廣東義山，《吉隆坡廣東義山八十三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廣東義山，1978。
- 伍松發編，《雪隆廣肇會館 120 週年暨義學 80 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隆廣肇會館，2007。
- 特刊出版委員會，《馬來西亞雪蘭莪嘉應會館七十七週年紀念刊》，吉隆坡：雪蘭莪嘉應會館，1980。
- 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委員會，《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1885-1985)》，吉隆坡：馬來西亞雪蘭莪福建會館，1986。
- 陳敦川主編，《馬來西亞雪蘭莪瓊州會館慶祝百週年暨天后宮開幕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瓊州會館／天后宮，1989。
- 雪蘭莪葉氏宗祠百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雪蘭莪葉氏宗祠成立壹百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葉氏宗祠，1993。
- 編委會，《吉隆坡廣東義山百齡特刊》，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1995。
- 雪蘭莪福建會館《115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雪蘭莪福建會館 115 週年紀念特刊(1885-2000)》，吉隆坡：雪蘭莪福建會館，2001。
- 雪隆葉氏宗祠一百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委員會，《馬來西亞雪隆葉氏宗祠成立一百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隆葉氏宗祠，2015。
- 第 118 屆館史編輯委員會，《雪隆惠州會館館史》，吉隆坡：雪隆惠州會館，1996。
- 編輯委員會，《陳氏書院宗親會八十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陳氏書院，1986。
- 編輯委員會，《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八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1977。



## (二) 近人論著

### 1. 專書

- 夫馬進著，伍躍、楊文信、張學鋒譯，《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陳哲維，《殖民與移民：史密斯、金文泰總督與新加坡華人社團》，新加坡：南洋學會，2015。
- 麥留芳，《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5。
- 黃海妍，《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清代以來廣州合族祠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8。
- 楊進發，《新馬華族領導層的探索》，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
- 顏清滄著，粟明鮮、陸宇生、梁瑞平、蔣剛譯，《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1。
- Baxstrom, Richard. *Transforming Brickfield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a Malaysian C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 Cheah, Boon Kheng. *The Peasant Robbers of Kedah, 1900-1929: Historical and Folk Perceptions*. 2<sup>nd</sup> ed. Singapore: NUS Press, 2014.
- Goodman, Bryna.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Gullick, J. M. *A History of Selangor (1766-1939)*. Kuala Lumpur: MBRAS, 1998.
- Gullick, J. M.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6-1939)*. Kuala Lumpur: MBRAS, 2000.
- Manderson, Lenore. *Sickness and the State: Health and Illness in Colonial Malaya, 187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North, Douglass C.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 Pountney, A. M., ed. *The Census of the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911*. London: Darling & Son, LTD, 1911.
- Reid, Anthony.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 West Sussex: Wiley Blackwell, 2015.
- Sadka, Emily.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1874-1895*.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idhu, Manjit Singh. *Kuala Lumpur and its Population*. Kuala Lumpur: Surinder Publications, 1978.
- Sinn, Elizabeth Yuk-ye.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Eurospan, 2003.
- Szonyi, Michael.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 Tarling, Nichola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2, Part 1, *From c.1800 to the 19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Warren, James F. *Rickshaw Coolie: A People's History of Singapore, 1880-1940*. Singapore: NUS Press, 2003.
- Wong, Lin Ken. *The Malayan Tin Industry to 1914: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tates of Perak,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and Pahang*.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5.
- Wong, Yee Tuan. *Penang Chinese Commerce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ig Five*. Singapore: ISEAS, 2015.
- Wu Xiao An. *Chinese Business in the Making of a Malay State, 1882-1941: Kedah and Penang*.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 Yeoh, Brenda S. A. *Contesting Space in Colonial Singapore: Power Relations and the Urban Built Environm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 論文

- 毛迪，〈慈善？迷信？——1929-1936年廣東中山縣民間慈善團體的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5。
- 阮湧仰，〈吉打客家籍甲必丹與華人方言群社會的互動——以戴春桃與羅啟立為個案〉，金寶：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碩士論文，2013。
- 李業霖，〈吉隆坡最後一位華人甲必丹：葉觀盛〉，收入李業霖，《讀史與學文》，吉隆坡：紅蜻蜓，2010。
- 吳佩珊，〈英殖民政府對吉隆坡華人事務管理——從自治至法治的轉變(1868-1914)〉，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 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收入李業霖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
- 莊仁傑，〈甲必丹制度的現代變奏：以柔佛古廟遊神為個案〉，《民俗曲藝》，第212期(臺北，2021.06)，頁1-42。

- 莊仁傑，〈殖民統治方法變動的契機：以 1912 年吉隆坡華人騷亂為核心〉，《新史學》，第 34 卷第 4 期(臺北，2023.12)，頁 163-214。
- 曹佳，〈從政策公佈到生效：政策實施的時間差分析〉，《公共行政評論》，第五期(廣州，2020)，頁 144-159。
- 黃文斌，〈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1859-1920)〉，《亞洲文化》，第 32 期(新加坡，2008.06)，頁 103-126。
- 張曉威，〈方言群的消長與幫權政治的發展：以十九世紀的吉隆坡華人社會為探討中心〉，收入鄭文泉、傅向紅編，《粘合與張力：當代馬來西亞華人族群內關係》，加影：新紀元學院，2009。
- 張曉威，〈甲必丹葉觀盛時代的吉隆坡客家幫權政治發展(1889-1902)〉，《全球客家研究》，第 9 期(新竹，2017)，頁 159-182。
- 張竹彤，〈華人生意與領導網絡——葉亞來和葉觀盛個案研究〉，收入謝愛萍主編，《馬來西亞廣東人研究論文集》，吉隆坡：馬來西亞雪隆廣東會館，2007。
- 蔡志祥，〈選擇的記憶：以《濟陽世澤：附丁氏族譜》為例〉，收入饒偉新主編，《族譜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蔡志祥，〈孝道與宗教慈善：新加坡義安城的濟幽法會與潮人族群傳統的再造〉，收入張禹東、莊國土主編，《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第 2 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 廖小菁，〈「仙居古廟鎮蠻邦」：拉律戰爭與何仙姑信仰在英屬馬來亞的開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00 期(臺北，2018.06)，頁 47-84。
- Benda, Harry J. "Political Elites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An Histor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7, no. 3 (1965): 233-251.
- Chin, Yoon Fong.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of Selangor 1896-1906." *Malaysia in History* 15, no. 1 (1972): 30-42.
- Elson, Robert E. "International Commerce, the State and Society: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2, Part 1, *From c.1800 to the 1930*,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127-19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Ileto, Reynaldo. "Religion and Anti-colonial Movement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2, Part 1, *From c.1800 to the 1930*,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75-1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Trocki, Carl A.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Vol. 2, Part 1, *From c.1800 to the 1930s*, edited by Nicholas Tarling, 75-1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Yap Kwan Seng the last Chinese Kapitan in Selangor:  
The Last Movement of the Ol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1890-1902)**

Chong, Ren-jie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old political system of Britain's Southeast Asian colonies maintained its influence, and how this influence was challenged by others during the last stage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political system to the new on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examines how the kapitan system, a representative component of the old political system, continued to play a role and exert influence as various new constraints arose, such as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and the banning of secret societies. This article uses the case study of Yap Kwan Seng, the last kapitan of Selangor (1890-1902), to investigate how Chinese leaders maintained their political power, status, and leadership rol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new political systems in the 1890s, during which new Chinese institutions were established, including the Yap Clan Association, the Tung Shin Hospital, and the Cantonese Cemetery, as well a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Kuala Lumpur Chinese Community.

**Keywords: Kapitan, Yap Kwan Seng, direct rule, indirect rule, British colony, protector of Chinese, Kuala Lumpur**